



軍事戰略

局部戰爭空權思想 對中共空軍建軍的影響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

提 要

中共歷經懲越戰爭失敗後，雖然強化建軍當以攻勢的空軍為先，但受限於科技發展的限制僅止於口頭上冠冕堂皇的宣稱。及至遭逢外國局部戰爭的發生，才驚覺到攻勢空軍對戰爭扮演關鍵致勝因素。經評估後遂將建軍備戰思想「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思想」，以作為國防建軍憑據，方奠定現代化發展的根基。這是中共空權發展上一個關鍵性的觀念轉變，影響後續發展甚鉅。

壹、前言

1979年2月17日中共發動懲越戰爭失敗後，遂將「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註1】}著重軍事現代化整備，以因應下一場戰爭的來臨。但此時期僅止與認知「空權思想」想法上，及至「局部戰爭」時期，見諸英阿福島戰爭及以敘貝卡山谷等戰爭空權的實踐性，方實至名歸的落實空權建軍。這是在研究中共空權建軍的旅程上，必須先了解到的一個觀念上的根本改變因果關係。曾如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強調：「缺乏歷史這項工具，則無由建構起任何理論」。^{【註2】}這也就是研究軍事史上著重「因果」關係的詮釋所必須了解的一

註1 Gerald Segal, *Defending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5), pp.221-223.

註2 奎格瑞·甘迺迪(Gregory C. Kennedy)、凱西·尼爾森(Keith Neilson)著，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國防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36。



個重要關鍵點。必須檢驗事實的發生真相與影響，演繹出符合發展的規律。英國史學家柯林烏(R. C. Collingwood)所說：「歷史是一種研究，也代表著真理。如此，歷史對於人類才能發生偉大的作用。」^{【註3】}所以本文的重點，在於研究局部戰爭空權思想對中共空軍建軍產生的影響。

貳、面對未來局部戰爭中共空軍作戰特點

中共空軍受著建軍指導思想朝向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局部戰爭的戰略轉變，為適應此新的形勢要求，展開對局部戰爭的研究，強化對現代空軍戰役作戰特點的分析，並有系統的綜整以往戰役理論的研究成果，完成空軍戰役學的編撰，以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戰役理論，提高了空軍戰役理論的水平。^{【註4】}

二次大戰之後，受著軍事科技技術的發展影響，武器裝備的性能、威力異於往昔，促成了戰爭理論與手段、方式產生了許多變革，如同恩格斯所說：「一旦技術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的改變甚至變革」。^{【註5】}機槍的出現，騎兵為之膽怯；坦克的出現，造就閃擊戰的策略；航母的出現，淘汰艦砲威力的戰術；這顯示，科技的進步，新的武器產生，自然而然對戰爭型態產生革命性影響。

而航空技術的發展與運用，不僅改變三度空間作戰方式，由過去僅能從事日間作戰改變為全天候全時作戰；由過去突擊所遭受地面防空武器的攔截所受的災損，在實施作子作戰的干擾後，竟能如入無人之地；其它諸如空中加油機、航空引擎與火力威力的革新，加速作戰效益。面對此環境的挑戰，中共空軍研判未來所面對空中戰役的特點：

一、將面對武器裝備佔優勢的敵人：中共認為其空軍武器裝備比起世界軍事技術先進的國家而言，大約落後20-25年，如同軍委主席鄧小平曾說：「即使能爭取10-20年的時間來實現我軍裝備的現代化，那時同敵人比較起來，武器裝備也將仍處於劣勢」。此時期，中共空軍雖然在量化上佔有絕大多數優勢，但受著地理位置限制，周邊機場數量少，兵力容量有限，且受航程影響，航空兵就無法達到南沙群島等作戰地區，如此一來，中共空軍不僅在數量尚且在質量上都將處於劣勢。對此，中共認為必須充分認清此落後特點，看出差距，認真評估，採取在作戰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武器裝備和戰術戰法的運用上，揚長

註3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9月），頁22。

註4 中共空軍司令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役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6。

註5 同前註，頁10。



避短，以長擊短，以降低敵人武器裝備技術優勢的作用。【註6】

二、作戰空間範圍更加廣闊：現代空中作戰面臨一個寬正面、高度、縱深範圍更廣闊的三維作戰空間，能否適應此種作戰環境改變的空間作戰，已成為評估空軍作戰能力的重要指標。可是中共空軍的現階段戰機作戰半徑小、機載武器射程短、在缺乏空中加油能力狀況下，僅能從事國土內防空。中共認為為了要彌補此缺失，唯有依靠合理部署和廣泛機動方能適應戰場擴大的需要，也就是說面對挑戰，航空兵不僅要能在戰區範圍內進行機動，更要在戰區之間進行戰略機動。為此，中共從強化裝備訓練、機場建設、指揮管制等各項保障方面採取措施，以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和機動作戰能力。【註7】

三、作戰的突然性、速決性增大：

隨著武器裝備的科技進步，精確導引飛彈的發明、電子作戰能力的提升、空中加油機的問世及隱形技術的使用與戰術戰法的精進，使得戰爭的爆發是以「突擊－出其不意」為先機；以全時不分晝夜來從事作戰，使敵人在來不及防備的情況下遭到措手不及的打擊。如以阿第三次戰爭，以色列選擇晨間上班時刻；美利之戰，美軍選擇凌晨時段；皆造成對方傷亡重。

且戰爭極為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拿破崙就說戰爭打的是金錢、金錢還是金錢；正所謂「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支撐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如近期的局部戰爭中所消耗的經費就十分驚人，以阿第四次戰爭18天中，雙方耗損都在50億美元以上；以敘第五次戰爭，歷時7天，以軍戰費高達7億美元；英阿福島戰爭，英軍耗資20多億美元。【註8】所以如何在戰爭的進程縮短腳程，那就是主動、突擊、速決 (by the quest for quick and decisive victories)。【註9】

四、聯合作戰程度越來越高：

從戰爭的演進來看，一次世界大戰戰機僅止於從事偵查是陸軍的眼睛；及至二次大戰，空軍不僅擔任陸軍密接支援的任務，更可伴隨著海軍從事空中掩護或阻絕任務的執行，甚而從事戰略轟炸的攻擊，將空中的效益發揮到三維空間；隨著二戰後武器裝備的發展，如空中預警機、加油機、電子戰機(含可從

註6 同前註，頁11-12。

註7 中共空軍司令部編，前揭書，頁12-13。

註8 藤進富、姜富生，《空軍作戰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263；中共國防大學編，《軍事思想論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78。

註9 Ka Po Ng,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Doctrine makes readi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年), p. 82.



事偵查、干擾、攻擊的電子飛機)，空中戰場在各種功能的戰機聯合作戰保障情況下，邁入五維的作戰領域，不僅跨越了立體空間，更引領進入空中指揮、管制、資訊與電子作戰，這種異於往昔的作戰型態顯示，技術裝備的先進，作戰系統的相互之間配合與支援，作戰取勝的機會將會增加。1982年以敘貝卡山谷的戰役，就是最佳典型的戰例。

中共空軍過往的戰役僅參與過抗美援朝的防禦戰，絲毫未曾實施轟炸的攻勢作戰，遑論多機種戰機的合同作戰，因此，在面臨未來局部戰爭，除了要重視武器裝備的改善之外，更要朝向聯合兵力的作戰準備(mix of forces)，來因應局部戰爭的主動防禦的戰略(active defence strategy)挑戰。【註10】

五、電子作戰激烈的對抗：

中共在研究例次局部戰爭中發現，運用電子戰設備於武器裝載平台，將有效提升武器生存能力與增強作戰效益，如美軍在越戰中，未加裝電戰設備前，越軍平均發射17.6枚導彈即可擊落1架美戰機，加裝後，擊落1架美戰機需要越軍66.7枚導彈；【註11】同時研究發現，加裝電戰設備的轟炸機，突防的生存能力可提高到40%-60%；加裝在戰鬥機上，戰損率可由原先10%-20%降至3%。【註12】

又如1982年的以敘貝卡山谷之役，以色列根據1973年以阿第四次戰爭的教訓，在戰爭初期遭受埃及薩姆—6防空飛彈群的攔截，擊毀戰機109架。戰後，在美國援助下發展了一整套專門對付阿拉伯國家的電子戰技術和戰術。在6月9日的空戰中，以軍出動3架雷達預警機和電子干擾機，不僅有效進行了戰場監視，還大量施放電子干擾，使敘軍地面塔臺同飛機之間，飛機同飛機之間，薩姆—6防空導彈指揮部同各發射陣位元之間的通訊聯繫陷於中斷或混亂狀態，致使敘軍飛彈無法命中目標，其陣地內薩姆—6防空飛彈群反遭以軍反輻射飛彈為之摧毀殆盡。【註13】

由此可見電子作戰在戰爭中所扮演攻、防互補角色的重要性，其所具備「軟殺」能力，將成為空中力量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西方學者專家認為：「現在已進入電子戰時代，電子戰是突破導彈防禦的關鍵，當前奪取和保持作戰中

註10 Ka Po Ng, op. cit., pp.81-82;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4年)，頁97。

註11 劉義昌主編，《高技術戰爭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62。

註12 藤進富、姜富生，前揭書，頁120。

註13 海鋒，〈黎巴嫩戰火〉，《解放軍報》，1982年7月30日。參閱<http://db1.greatman.com.tw>；崔長琦主編，《世界百年空戰紀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頁633。



電子戰優勢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奪取空中優勢還重要」。^{【註14】}

六、空中作戰將是高強度、高耗損的作戰：

二次大戰前後，空軍僅是附屬軍種，僅擔任協防工作，但是對現代戰爭而言，空軍不僅須擔任自己本身任務的遂行，任何有關兵種協同的任務，亦必須兼顧，如此才能掌握空權，利於戰爭進行。然而在武器的效益鬥爭上，空軍隨著武器的精進，在瞬息變化的戰場上作戰而更加激烈與耗損，如以阿第三次戰爭中，以色列在不到3小時內，就擊毀埃及300多架戰機，開戰60小時後就摧毀阿方空軍力量；以阿第四次戰爭中，雙方投入6,000輛坦克，戰機2,000餘架，艦艇200多艘，經過18天的交戰後，雙方損失坦克3,000餘輛，戰機640架，艦艇59艘；英阿福島戰爭中，雙方戰損的29艘艦艇中，90%是由雙方戰機所摧毀；^{【註15】}以敘戰爭中，雙方參戰戰機共400餘架，一個星期內，雙方即損失100餘架。^{【註16】}

上述顯示，交戰雙方為爭取制空，無不投入所有戰機，從事進攻、防禦型作戰。面對面著撕殺，不僅是技術的較量，更是電子戰、欺敵戰、戰術戰法等十八般武藝均須亮相的空中化戰爭，是劇烈而耗損大的。基此，面對高強度、高耗損的作戰，當尋求高效益、低耗損的作戰模式的戰爭，即速戰速決，以追求最後的勝利，乃是今後戰場上的空權戰爭型態。

參、現代條件下局部戰爭對中共空權影響

雖然中共受外軍戰役經驗影響，領悟到擁有軍事技術的先進諸如：電子戰、遠程突襲、空中加油機、空中預警機等科技能力，將對戰爭勝負產生絕對影響，可是中共從毛澤東時代就強調武器裝備的重要性，他說：「要依賴落後的武器裝備，來反制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保護國家領土的安全，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擁有先進的技術與戰術，如此才能贏得現代化的戰爭」。^{【註17】}然而建軍30多年來，中共空軍仍然是以不入流的武器裝備來從事戰爭準備，探究原因如下述：

一、中共空軍現況缺失原因：早期中共的建軍備戰，無不受蘇聯影響，雖然雙方於1960年代撕破臉後，然中共仍用其所提供武器裝備作為國防建軍發展的藍本，其建軍思想是以蘇聯為馬首是瞻。因此，早期蘇聯對「制空論」的看法間接

註14 劉義昌主編，前揭書，頁240。

註15 藤進富、姜富生，前揭書，頁139-272。

註16 中共空軍司令部編，《1986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6年），頁18。

註17 Ka Po Ng, op. cit., p.51.



影響到中共對空軍建軍的觀點深遠。

(一) 蘇聯未重視空軍發展：

1. 30年代，蘇聯國防人民委員弗羅希洛夫，指斥帝國主義將賭注押在空軍身上，認為杜黑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2. 1957年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出版M. A. 米爾斯泰等人所撰寫的《論資產階級的軍事科學》書中提到杜黑理論：「杜黑所有著作都是建立在力求尋找一種不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武裝力量和不需要進行持久戰的鬥爭方法的基礎上。無疑的，這一切都反映了資產階級害怕持久戰和他們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可能轉變為國內戰爭，轉變為革命的本能的恐懼」。
3. 1976年版蘇聯《軍事百科全書》中論述空軍制空論說到：空軍制空論是表述空軍在軍事行動中起主導作用並能單獨決定戰爭結局的一種概念。此理念符合資產階級那種不需建立龐大軍隊就能達到軍事目的的願望。此理論在20-30年代曾經流行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杜黑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4. 1983年蘇聯《軍事百科詞典》說到：杜黑提出空軍起主導作用的理論，認為只要空軍取得了制空權，就能以突擊敵人後方與經濟中心的方式來決定戰爭的結局。此理論反應西方害怕軍隊士兵起來革命資產階級的利益。世界大戰和後來的局部戰爭經驗證明杜黑的見解是沒有根據的。【註18】

此顯示，雖然蘇聯二次大戰初期即遭受到喪失制空權的慘痛影響，但是此種輕忽空軍角色的情況直至1988年，才在蘇軍統帥人物的講話中，多次提及陸、海、空三軍一體，開始重視空權的發展。【註19】而這種體認，中共要到波灣戰後方深刻領悟到。

(二) 中共視空軍為陸軍附屬品：

1. 1952年1月中共軍事學府出版的《空軍戰役法概則》教材指出：杜黑的理論誇大空軍的地位，作出錯誤的結論。1958年5月版《空軍戰役法概則》教材指出：空軍制勝論是毫無根據的，這是由於侵略的戰爭本質，企圖以機械代替人的作用為其戰爭服務的一種幻想。
2. 1987年中共軍事科學院出版的《戰略學》書中提到：杜黑制空論一書，對各國空軍的建設與運用有廣泛的影響性，但過分誇大空軍的作用，而貶

註18 董文先，胡思遠，《杜黑理論與空軍》（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3。

註19 同前註，頁42。



低陸軍和海軍的作用，則不免失之偏。

3. 1988年中共權威軍事雜誌創刊號刊登〈論軍事科學〉的文章指出：兩次大戰之間，義大利杜黑的空中戰爭理論，英國富勒提出機械化戰爭理論。上述戰爭理論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對外擴張，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由於他們主觀片面誇大某種新式武器或某軍種的作用，往往得出的是錯誤的結論。

4. 1989年5月版中共《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指出：空中戰爭論（空軍制勝論），是新條件下的反映產物，但戰爭實踐證明，儘管空軍可以獨立作戰，並在現代戰爭中起重大作用，但主張單靠空軍就可以決定戰爭結局的理論是錯誤的。只有各軍、兵種協調一致的行動，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

其次說到，杜黑根據戰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運用，而比較有系統的提出空軍建設和作戰的理論，此理論稱為「空軍制勝論」，其理論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各國的空軍建設，尤其對轟炸機的發展曾有過重要影響，但實踐證明，他的一些觀點雖值得重視，但誇大空軍作用，認為單靠空軍轟炸就能贏得勝利，則是錯誤的。

5. 1989年6月版中共《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指出：杜黑誇大制空權的作用，認為奪取制空權就有剝奪敵人生存的可能，就可取得戰爭的勝利。

6. 1991年波灣戰後，中共對美國防部在「波灣戰爭」的報告中闡述：空中力量在戰爭中起「決對性作用」的結論不以為然。【註20】

上述不僅顯示中共空空軍的發展是受蘇聯忽視「空軍制勝論」的觀點影響，遂使中共在軍事領域發展上一直是大陸軍主義(exclusively with campaigning on land and ground forces operations)，堅持「陸軍主導」論和「步兵決勝」論，遂導致傳統上長久以來中共空軍僅是附屬(次等)的軍種。【註21】

尤其共軍近幾10年所進行的戰爭，主要都是陸軍打的，勝利主要歸功於有優良的傳統、久經考驗的步兵。因而50年代軍事教材都認為整個戰爭的結局主要是陸軍決定的，航空兵不能獨立取勝，1964年印發全軍的指示中還特別強調：將來打戰主要還是靠步兵。【註22】

所以西方學者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g就說，50-80年代，

註20 董文先，胡思遠，前揭書，頁3-5。

註21 Ka Po Ng, op. cit., p. 87.

註22 董文先，胡思遠，前揭書，頁42。



毛澤東與其繼承者皆致力於建立核武與飛彈能力，致使空軍現代化的訴求受挫。即使在文革時期，毛澤東仍因極力捍衛戰略武器發展計畫，而擱置大部分的傳統武器研發工作，當時空軍和其他傳統武器發展不僅未獲國家關注，甚至遠不及炸彈和飛彈運輸系統之研發來得重要。且60-70年代，毛澤東與其黨羽重視地面部隊，將海空軍侷限於附屬地位，並附合共軍重視「國內防空、支援陸海軍」作戰任務綱領。^{【註23】}遂造成中共空軍的發展無法滿足懲越戰爭之需要，因為當時空軍僅具有近距離空中偵察與空中掩護的功能，絲毫無法跨越國界從事攻勢的密接支援的空對地的聯合作戰。^{【註24】}

（三）缺乏適當的攻勢準則：

造成中共在懲越戰爭的失敗，可說是中共並沒有一套完善的空軍用兵準則思想，不認為杜黑制空論所闡釋「空權的重要性」，「未來戰爭的本質將是空中戰爭，因此不但空中艦隊的重要性會很快的加高，同時陸海軍的重要性將會迅速的減低」。「唯有以攻勢的積極戰鬥手段才能獲得勝利」。^{【註25】}驗證以色列突擊伊拉克核子反應爐及貝卡山谷之役勝利，正凸顯空軍角色的轉變，以非昔日舞台上配角。

美軍前空軍參謀長李梅上將(Curtis E. LeMay)針對準則與空戰的關係說到：「戰爭的重心在準則，準則是為大家訂出戰爭整備之中心思想以贏得勝利。準則是受經驗所強化之心智、信心與知識之結晶，而此類經驗則是人員、裝備、和戰術使用之最佳典型。準則是卓越判斷之基礎。」又說：「準則為執行專業判斷之指導」。^{【註26】}美國哈利少將亦說：「沒有準則或頂多只是定義不明的準則，軍用飛機的發展注定要遭殃」。^{【註27】}這都說出空軍兵力運用與準則之間關係。

因為，準則是吸取以往戰爭的教訓，思考其所處時代的戰爭與衝突性質，並預測未來的知識與技術發展。是用來指導軍事指揮官及其參謀從事相關的計畫作為，俾有效運用軍事部隊以達成特定的軍事目標。^{【註28】}

註23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中共崛起》(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年)，頁125-126。

註24 Ka Po Ng, op. cit., p.65.

註25 杜黑著，馮德彪、游崇鼎譯，《制空論》(台北：三軍大學，1984年)，頁5、48。

註26 普德漢(Aldon E Purdham Jr.)著，郎永才譯，《美國最重要的空戰學到抑或是錯過的教訓》(台北：空軍總司令部，2005年)，頁2。

註27 梅茲(Mets)、黑德(Head)著，趙宏斌譯，《空中用兵紀實——對美國空軍戰略攻擊理論與準則的省思》(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5年)，頁486。



中共不僅受制於蘇軍影響，更因為缺乏空軍準則用兵思想，空軍的兵力皆以殲擊防空為主，是來自於60年代「人民戰爭思想」，忽視具有攻勢能力的軍備發展，致使進入80年代，作戰準備僅是高談闊論、紙上談兵，而未落實「兵力結構」的轉變調整從「防禦型空軍轉向攻擊型空軍發展」，也就是重視新武器系統載具的發展；更因為受政治的狂熱優於軍事專業、人為因素高於武器裝備的精良觀念影響，致使政治教育優於軍事訓練為先，遂阻礙中共軍事準則、組織、訓練與裝備的發展；再加上中共過去一直將空軍看成為一附屬的軍種，【註29】遂使落後的裝備無以面對局部戰爭可能遭受的威脅。

二、重視中共空權思想的演變：

中共自1968—1979年以來，人民解放軍一直在準備「早大、大打、打核戰爭」，1975鄧小平與中央軍委會特別擴大會議中對「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加以重新評估，而提出世界大戰可能「延遲」爆發的觀點，「和平與發展」取代了戰爭準備工作，成為中共的國家安全基礎。【註30】

1977年，鄧小平又再次復出擔任總參謀長及中央軍委會副主席的身分督導人民解放軍的事務，經過1978—79年，聶榮臻等人在軍事會議中開始溫和質疑毛澤東「人民戰爭」準則之效，1979年對越南進行一笨拙戰爭後，對「人民戰爭」的批評也就更加強烈，1980年3月12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會擴大秘密會議中主張修訂準則，質疑「人民戰爭」的「誘敵深入」準則已不在適用於「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並將毛澤東長期以來所使用的「誘敵深入，積極防禦」口號，巧妙改為「積極防禦」，同時還進一步表示，積極防禦不應再包含縱深防禦，而應包含邊境防禦。同時強調武器與技術在戰爭中的重要性。

【註31】

期間，1979年1月18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對中共空軍的主張指示：「若無空軍和制空權，則不可能在未來戰爭中獲勝，陸軍需要空軍支援和空中掩護，若無空中掩護，海軍則不可能在戰役中獲得勝利，所以要將空軍的發展列為優先項目，著重對航太工業和空軍發展之投資以獲取制空」。【註32】後來又說：「裝備也有個輕重緩急，搞甚麼？我腦子裡，恐怕還是空、海軍」。【註33】

註28 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 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4年)，頁88。

註29 Ka Po Ng, op. cit., pp.55-75.

註30 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前揭書，頁93。

註31 同前註，頁94。

註32 麥可·布朗 (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 (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 (Sean M. Lynn-Joes) 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19。



事後遂發佈一系列的空軍任務指導方針，並表示：積極防禦並不全然侷限於防禦的概念，積極防禦亦包含攻擊要素，當遭受攻擊時，必須加以反擊，轟炸機是防禦武器，吾等必須擁有他人的裝備，而欲摧毀吾等者勢將遭到報復。此呼籲空軍原本從純粹防禦改為攻守並重。因此，共軍戰略專家開始著手更新「嚇阻的中國化概念」。研究西方高科技戰爭的文獻，並作出以下的結論：為了達成軍種整合的目標，空軍必須增加更多的攻擊兵力。【註34】

1983年至1985年，鄧小平針對國際形勢指出，美蘇兩超級大國都不可能發動世界大戰，且指出中共軍事基礎只能配合經濟與國防科技機構的全面發展，而逐步進行現代化。又鑒於「懲越」戰爭中表現欠佳，鄧小平再三譴責中共軍隊為一支不適任的部隊，因此，再次要求從事進一步的軍事組織之調整與精簡。

1985年5月至6月的中央軍委會會議中，正式確立了此戰略觀的改變，1985年12月，舉行另一次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中，鄧小平說：未來的戰爭可能會局部化，但非常激烈，當時的兩伊戰爭進一步證實了此種看法，因此，中共戰略計畫人員開始提出新的戰爭觀點：「局部戰爭」與「有限戰爭」取代「總體戰爭」，成為國際衝突的普遍型態。於是中共內部開始展開局部戰爭的分析工作。認為局部戰爭是在一有限地區的戰爭，雙方交戰是以傳統武器為主。戰爭的緣起有時是為了爭奪資源；有時因邊界的衝突而起；有時是主要強權代理國之間的戰爭；有時是被認為要確保地區或區域「霸權」，或勢力範圍的戰爭。【註35】因此中央軍委決定：一、將傳統武器發展置於戰略武器之前；二、軍方必須提昇現有傳統武器戰力並起用新的武器系統；三、此刻海、空軍被賦予優先發展；而在所有軍種中空軍發展被視為第一要務。【註36】

同時，中央軍委賦予中共空軍作戰任務為：捍衛戰略節點；提供大規模戰略部署所需之空中掩護；維持主戰場之制空權以支援陸軍和海軍；對敵軍重要目標發動奇襲；參與核武逆襲行動及執行空中偵察任務等。此外，中央軍委指示空軍做好因應敵軍空襲準備，並支援其它軍種抵禦敵軍地面進襲或發動反攻。【註37】認為局部戰爭的軍力的發展應朝向具有優勢(質)軍備俾能應付一場小

註33 余愛水，《軍事與經濟互動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頁119。

註34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27-128。

註35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前揭書，頁95-97。

註36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22。



型戰爭，漸而發展成具有攻勢兵力以應付一場類似台海衝突的中型戰爭，及至下一世紀發展具有戰略的兵力以應付一場大型戰爭。只是此時中共在缺乏現代化武器裝備情況下，其準則用兵思想方面－「從現代化的人民戰爭思想」朝向「現代化的局部戰爭思想」來從事戰準備是與實際的軍事能力上存在著一個很大裂口。【註38】

因為當中共在1985年即開始轉移原先極重視陸地的軍事戰略，而朝向發展空軍為優先時，適逢北京與越南及其他東南海國家爆發的南海主權爭議，使所有發展空軍優先的計畫蒙上陰影。就因此矛盾政策，導致政府高層再次重視戰略武器、其次海軍的發展；【註39】如同中共前將領李際均對中共現今戰略的看法說是一種「積極戰略」(active defense)。「積極戰略」是與周邊弱小鄰邦，尤其是沿海地區，發生小規模高科技戰爭的戰略。構成此區域的防禦是從南沙群島、台灣及釣魚台延伸至朝鮮半島北方所形成島鏈，中共企圖成為此區域內的統治強權。為達成此目的，中共將強化高科技的發展以支援積極防禦，其建軍方向是朝向海軍現代化為首要，尤其是發展潛艦的軍力，【註40】接著才是空軍「快速反應部隊」(rapid reaction units)。【註41】

針對中共要建立一個「戰略邊疆」(Strategic Boundary)的防禦區，即中共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所闡明第一、二島鏈觀念，美學者李潔明認為「中共積極防禦區」(Chinese Zone of Active Defense)的概念，其戰略目標是希望獲得戰略縱深，先是發展阻絕外力進入鄰近中共邊界地區之必要戰力，然後再發展控制此區域之戰力，質言之，中共戰略家希望一旦發生戰爭，中共應尋求在國界外而不是在國界上完成制敵的勝利。中共研判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是台灣、南海及朝鮮半島。【註42】

面對此戰略建軍原以空軍為首，後來調整為以海軍為首、空軍次之的先後順序，此時，又受著80年代初，經濟惡化的影響。因而使空軍優先發展的計畫

註37 同前註。

註38 Nan Li, <The PLA's Evolving Warfighting Doctrine, Strategy and Tactics, 1985-95: A Chinese Perspective>,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Oxford, 1997), pp. 184-190.

註39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26。

註40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2001), p. 166。

註41 漢斯·拜尼迪克(Hans Binnendijk)、雷諾·蒙太波托(Ronald N. Montaperto)主編，《中共戰略趨勢》(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頁60-61。

註42 同前註，頁13。



失敗，空軍的發展因而受挫。無怪曾任中共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張愛萍於1981年時，感嘆的說空軍是共軍三軍中最弱的一環。【註43】

上述中共空權發展列為建軍首要雖然立意甚佳，但受制於政策與經濟影響，空軍優先發展戰略政策直到90年代才趨成熟。【註44】

三、強化空軍作戰理論之研究

在黨的11屆3中全會以後，中央軍委根據敵我鬥爭的新形勢提出「積極防禦」戰略方針，促使中共空軍理論研究進入著重「研究戰役理論」的新時期。研究的重點著重於對付敵人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組織軍事學術研究，研究和探討了未來反侵略戰爭初期抗擊敵人的戰略空襲、奪取制空權和在合同戰役中協同陸(海)軍作戰的理論。其戰略指導思想是堅持打人民戰爭的持久戰，其戰爭原則是積極主動、集中使用和充分發揮整體戰力等戰役原則。此時期，空軍於1979年2月至3月，參加了對越自衛還擊作戰，遵照空軍不出國作戰方針指示，空軍僅集中大量兵力於邊境內從事空中巡邏，嚇阻了敵空軍未敢飛至戰區上空活動，達到掩護地面部隊作戰行動的目的。【註45】

1981年8月，在一篇關於「制空權問題的探討」學術論文中提到「制空權通常是指軍隊控制空間的主動權」，意指奪取了制空權，通常意味著對方航空兵和地面防空部隊的作戰行動受到嚴重限制，從而保障己方陸、海、空軍的作戰行動和國家後方重要目標不受其嚴重威脅。而擁有制空權的重要性在於，現代條件下，制空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制空權雖不能決定戰爭勝負，但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能產生重大影響。未來反侵略戰爭是諸軍兵種合同的戰爭，敵人具有強大的空中力量，如果我們沒有相應的制空權，有些作戰的活動將會受到重大影響；有些作戰的活動雖沒有制空權也可能取得勝利，但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代價可能要大的多」。【註46】

1985年，為著因應「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構想，中共由過去的「人民戰爭戰略」構想，朝向「積極防禦戰略」構想來建軍，主要考量，是動用快速反應部隊從事防衛國界或邊疆(含與鄰國間存在的邊界爭議)，並逐退入侵敵人，甚要求逐退入侵海上資源的敵人(含敵人已佔領的海上島嶼)時，要重視主動防禦的「攻勢作戰」，掌握戰略主動甚率先攻擊，先發制人(如下圖)。以此

註43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21-126。

註44 同前註，頁122。

註45 中共空軍司令部編，《1986年中共年報》，頁5-6。

註46 華八杰、曹毅豐、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316。



取代了過去毛澤東的作戰思想「防禦、僵持、攻擊」。^{【註47】}

1986年6月，空軍司令員王海在向陸、海、空三軍幹部作「現代合同(即聯合作戰術語)戰役中的空軍作戰使用」的報告中說「樹立立體的合作作戰觀念，重視研究空軍在合同戰役



圖一 現代條件下局部戰爭想定

中的作戰使用，使空軍作戰和地面軍隊作戰有機地結合起來，密切協同，形成整體的作戰系統，充分發揮整體威力，是現代合同戰役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同時強調「合同戰役中，空軍的作戰行動應服從合同戰役的全局需要，以合同戰役的勝利為勝利」。^{【註48】}

資料來源：Larry M. Wortzel 主編，吳奇達、高一中、翟文中譯，《二十一世紀台海兩岸的軍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年)，頁139-220；You Ji,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9), pp. 2-4；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4年)，頁97。

空軍司令員王海亦針對空軍用於縱深作戰時指出，即把空軍作為戰役的掩護和機動突擊力量，有重點的集中使用於縱深作戰，也就是要打擊敵「戰役戰術縱深內的重要目標和突入我縱深的敵航空兵、快速機動集團和空降集團」，並使空、地作戰行動有效結合起來，對敵進行協調一致的整體打擊，以取得最大的作戰效益。^{【註49】}質言之，此時中共空軍才開始重視「深入敵縱深攻擊」用兵思想的探討研究。

198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依制空權的作用與規模來分類，可分為戰略制空權、戰役和戰術制空權；戰略制空權是指在整個作戰期間或戰爭某個階段、在一個或數個戰區內，較長時間內佔有制空權，對整個戰爭產生影響；戰役戰術制空權，是在重要的戰役方向上或有限地域內，較短時間內佔有的局部制空權，能對戰役戰術產生影響。並針對奪取制空權的方法說到，奪取制空權的

註47 You Ji,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9), pp. 2-4；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前揭書，頁97；Larry M. Wortzel 主編，吳奇達、高一中、翟文中譯，《二十一世紀台海兩岸的軍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年)，頁220。

註48 華八杰、曹毅豐、陳惠秀主編，《空軍學術思想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317-318。

註49 華八杰、曹毅豐、陳惠秀主編，前揭書，頁318-319。



基本手段是通過空戰和對空中作戰，將敵機殲滅在空中；通過空中突擊和地面襲擊，將敵機和地面防空兵器摧毀、壓制地面上，並突擊敵航空工業、石油工業、空軍基地，為削弱敵方空軍的作戰潛力。在實戰中，究竟採取那種較適當方法，當根據作戰企圖、交戰雙方的空軍和防空力量及戰場情況因素來確定，只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的、創造性的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才能有效的爭取和保持制空權。【註50】

根據上述，我們了解中共在此時期受著歷次局部戰爭的影響，方從過去輕忽空軍的建軍，致力於空軍軍事學術思想的探討，了解空軍在作戰中所扮演角色，由過去是陸軍的附屬品，如今是個含苞待放的花朵，將要成為戰場上先發主角；空軍不僅可從事獨立作戰，更可遠程攻擊、手段多樣化的突擊與速戰速決，【註51】正讓世人驚覺它的重要性。正如1984年美國空軍在《航空航天基本概則》中強調「航空航天的力量，是作為相互依賴的地面－海上－航空航天集團的一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它可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而在下一個戰場時代將會成為耀眼的攻勢「主角」。【註52】

不僅《空軍作戰》一書討論到上述論點，80年代末期，中共學者嚴學同亦說到：「為了確保我們經濟成就不致於受到戰爭危害，中國的軍隊必須在中國境外對敵作戰。此外，由於冷戰後，中國最可能面對的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因此，中國的軍隊必須有能力贏得高技術下的局部戰爭，俾拒敵於國境外」。【註53】

此說出面對未來高科技的挑釁，惟有落實拒敵於國境外的戰爭指導－發展高科技武器系統－空軍，方能保障國家安全。驗證90年代的波灣戰爭給予中共的震撼，中共高層方留意到空權發展的重要性，在學者專家軍事學術的研究成果指引下，方引領了空軍的建軍發展方向－朝向「高科技技術局部戰爭」的「殺首」攻勢武器的建軍目標來發展。【註54】

四、強化空軍武器裝備發展：

造成此階段常規武器的發展上遲滯不前甚而落後許多，原因是中共歷經「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國防體制混亂；且在政治鬥爭中，有系統的軍事訓練至少停擺10年；國防工業及相關研發機構也因為毛澤東的外

註50 同前註，頁316-317。

註51 藤進富、姜富生，前揭書，頁101-107。

註52 同前註，頁110-112。

註53 Larry M. Wortzel 主編，吳奇達、高一中、翟文中譯，前揭書，頁143-144。

註54 Ka Po Ng, op. cit., p.104.



交與國內政策影響而水準降低。蘇聯於1959-1960年間，終止了所有計畫；所推行政策上的「三線」策略，也就是將國防工業和研究中心遷移至中國境內，致使莫斯科撤出後，中國科技發展的境況如雪上加霜。這些錯誤的政策造成中共軍工業複合體的衰敗、失序又落後。鄧小平雖然在1970年代中期，認清到國防體制的缺陷，但要改善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20年來的輕忽與不當的政策所製造出來的問題，是無法在短期之內解決的。【註55】

因為中共認為50、60年代，其國家主戰飛機在技術上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不大，當時航空電子信息技術應用剛剛開始，所以殲-6戰機曾被1968年英國皇家空軍出版的「國際飛行雜誌」和1978年英國「詹氏年鑑」評為最佳戰鬥機之一。【註56】

然應驗在英、阿福島戰爭、以敘戰爭、美利之戰爭，電子作戰技術已成為作戰飛機戰鬥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亦是影響戰爭勝負主要因素。中共因戰機電子信息技術設備落後，因此其技術與世界先進國家水平開始拉大，空中戰力地位也因而開始削弱，於是強化空中力量武器裝備質量之提升，加強電子信息技術，乃成為下一階段重點方向。【註57】誠如鄧小平所說：「空軍停留在殲六的水平叫優越嗎？」因而特別重視空軍作戰力量的發展，以產生種「制約」力量。【註58】

基此，中共在波灣戰前雖強化其航武裝備之發展，更戮力於其電戰裝備之提昇，無非是認為要「建設空中力量，必須要先把武器裝備技術水平置於重要地位」。【註59】

但中共認為在此時期由於各項高科技仍處於單科獨進的知識和技術積累階段，礙於其本身科技能力不足，以致於對軍事的影響也只是有限範圍之單項突破，而不能使軍事裝備及其作戰形式產生全面性的革命影響，換句話說，此時期中共是處於心有餘而力有未迨之情境。如美國航空與航空科技周刊於1995年3月27日報導，中共獨立研製的殲-12型與殲-9型殲擊機及仿造米格-23的殲-11殲擊機，均因能力不足，配套未成，而未研發成功。【註60】

註55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主編，方淑惠、徐佳玲譯，《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頁367-368。

註56 彭光謙、王光緒等編，《軍事戰略簡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149。

註57 同前註。

註58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院，1994年)，頁138。

註59 張家駒、樓煥甲主編，《軍事認識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頁81。

註60 林長盛，《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頁232。



在中共航空工業科技條件能力不足情況下，所造成的後果是：中共於80年代起，僅想從文革時期停頓研發的J-7II、J-8、Q-5等型機做一性能提昇，但都沒進展；【註61】就以中共當局一直想研改殲-8型戰機來說，因為瀋陽殲-8型戰機自1964年開始研發，1969年進行第一次試飛，然後於1980早期正式開始服役，雖然經過20年來的構想終於問世，但是中共空軍一直對此型機不甚滿意，希望能提升其性能，1980年代晚期，由美國格魯曼公司(Grumman)所主導的「和平珍珠」(Peace Pearl)計畫，目的在於安裝美F-16戰機所使用之APG-66雷達之改良型，後因「六四天安門事件」，美國終止指此計畫，以制裁中共。

【註62】

又中共原計畫發展2套反彈導飛彈系統，即「反擊一」、「反擊二」，其中「反擊二」已經過5次測試，後來又研發「反擊三」系統，此「反擊」系統的研發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止。【註63】

另外中共於1960年初期，瀋陽飛機製造廠為因應F-4幽靈式戰機所造成威脅，而開始研發新型殲-9型戰機計畫，後來研發工作轉移至成都飛機製造廠；至1970年代初期，殲-9型戰機經過重新設計，成為13噸、速度2.5馬赫、裝有前三角翼戰機，與瑞典坤寶J-37戰機類似，然而1980年卻終止此研發計畫；但其基本的前翼構形卻沿用至其後的殲-10型戰機計畫，以因應蘇聯第四代戰機的威脅。【註64】

中共在研發武器上，唯一碩果是於1980年代初期，完成自行改裝1950年設計的舊式轟-5輕型轟炸機，以用於電子戰任務，稱為轟電-5(HD-5)，其最高時速可達540哩，最大航程1400哩，可伴隨攻擊機群至台灣。【註65】

面對此時此刻的情境，就如美國學者由冀(You Ji)說過：「硬體設備現代化可消除準則設計與應用上的差距」。【註66】過去在沒有準則情況下，中共兵力運用受到限制上的發展；如今軍事戰略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朝向攻勢導向的建軍準則，可是在缺乏適當的武器裝備，遂無法落實準則效益。美國哈利少將曾說：「空中武器的運用依賴兩個重要因素：準則和裝備，光

註61 Ka Po Ng, op. cit., p.74.

註62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主編，方淑惠、徐佳玲譯，前揭書，頁191；Larry M. Wortzel 主編，吳奇達、高一中、翟文中譯，前揭書，頁220。

註63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主編，方淑惠、徐佳玲譯，前揭書，頁221-222。

註64 同前註，頁187。

註65 同前註，頁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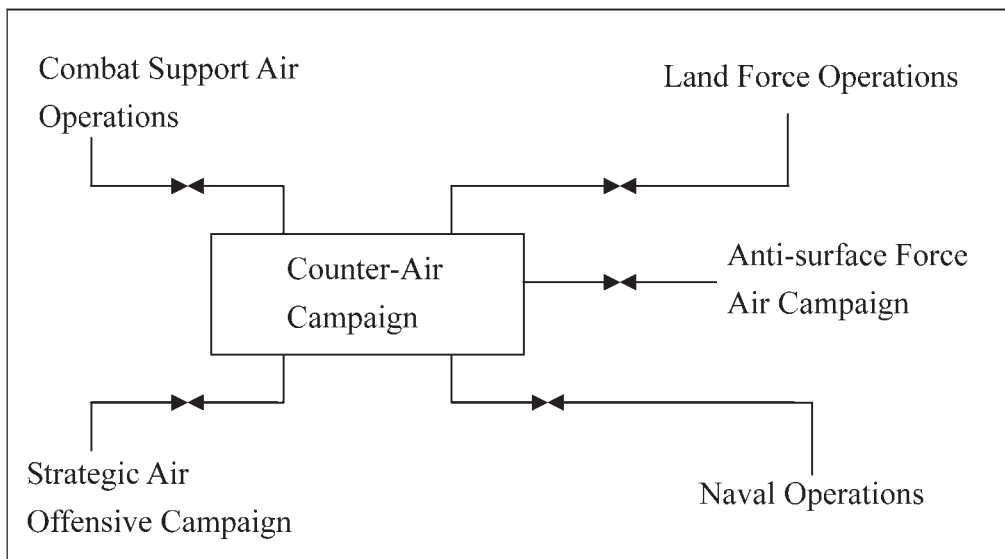
註66 前揭書，頁178。



靠準則無法贏得戰爭」。^{【註67】}也就是說：「沒有落實建軍目標，原因是中共並未具有現代化攻勢的軍備」所致。造成原因乃是中共一直無法引進國外的新武器系統。^{【註68】}

事實上也如此，根據中共編《空軍作戰》書中顯示：中共空軍的角色扮演是要奪取「制空權」，能主動出擊、空中壓制、空中掩護的攻擊型的空軍，^{【註69】}但要具有「制空」能力條件的空軍，不僅是要從事先發制人的主動攻擊，更必須先要具備有「戰略攻擊、空中掩護、對地、對海攻擊」等武器裝備的能力，如此才能達到所謂「攻勢」的空軍(如下圖二)。^{【註70】}因為「唯有以攻勢的積極戰鬥手段才能獲得勝利」。^{【註71】}

證諸以阿六日戰爭、以敘貝卡山谷之戰、美利之戰，勝利一方都是掌握此種攻勢能力；反觀，阿根廷的敗戰，受限於轟炸與攻擊作戰能力，因而雖佔有地利之便，卻未蒙其利，而失敗。因此，我們可以說：「為了獲得制空，必需對敵人的攻勢行動，作出前所未有的反制，亦即欲得制空權的國家，在需要時



圖二 The counter-air campaign - operational

資料來源：Andrew G. B. Vallance, The Air Weapon: Doctrines of Air Power Strategy and Operational Art (New York: St. Martin, s, 1996), p. 65

註67 梅茲 (Mets)、黑德 (Head)，趙宏斌譯，前揭書，頁489。

註68 Ka Po Ng, op. cit., pp. 99-104.

註69 藤進富、姜富生，前揭書，頁81-86。

註70 Andrew G. B. Vallance, The Air Weapon: Doctrines of Air Power Strategy and Operational Art (New York: St. Martin, s, 1996), 頁64-65.

註71 馮德彪、游崇鼎，前揭書，頁5。



，須能阻絕敵陸海軍於其基地，不僅使其失去戰力，而且要殲滅其有生力量。同時，又要能確使本國國土及領海不受攻擊，以保持陸海軍的戰力，並使人民能相當安定的繼續生活作息，簡言之，獲得制空即獲得勝利。因為，一國在空中戰敗，或者說它的飛機被趕出天空則其陸海軍便會絕望的被阻絕，任由敵人攻擊而毫無還手的餘地。因此失去制空便等於戰敗，只有接受敵人的談和條件。」【註72】

驗證中共現階段空軍軍力僅具有從事守勢作戰之防空能力(如下表)，過去仰賴毛澤東時代所強調量化的

表一 1985—1990年中共空軍軍力

陸軍地面防禦政策的國防軍軍備，顯然已經過時而失去它的光芒(fade out)。【註73】

如同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於1986至1987年曾報告中共空軍軍事力量時指出：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實際上仍然是一支具有有限防禦能力的軍隊。周邊國家空軍將領亦認為：其國家空軍能對中共空軍積極進攻，摧毀中共的地面目標，而無視中共空軍防空力量的抗擊與空中進攻力量的可能報復。【註74】中共感嘆在缺乏適當的武器系統裝備情況支持下，練就了一身好筆力，鑽研西方軍事學說，引領下一階段的挑戰。

然而隨著時間之推移，單項的高科技趨於成熟並開始走向相互借鑑、互相利用、相互支持的橫向綜合發展時期。因

項次	機型(人員)	1985 年數量	1990 年數量
1	Manpower	490,000	470,000
2	Bombers	620	470
	H-5(II-28)	500	350
	H-6(Tu-16)	120	120
3	Fighters	4,130+	4,450
	Q-5(Mig-19 FGA)	some	500
	J-5(Mig-17 FGA)	500(approx)	0
	J-5(Mig-17)	400	400
	J-6(Mig-19)	3,000	3,000
	J-7(Mig-21)	200	500
	J-8	30	50
4	Reconnaissance	190	290
	HZ-5(II-28)	40	40
	JZ-5(Mig-17)	60	150
	JZ-6(Mig-19)	90	100
5	Transport	403	453
	Trident	18	18
	IL-14(ex-Soviet)		30
	IL-18(ex-Soviet)	75	10
	Li-2(ex-Soviet)		50
	Y-5(Soviet An-2)	300	300
	Y-7(Soviet An-24)		20
	Y-8(Soviet An-12)	10	
	Y-11	0	25

資料來源：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 Yang, *China Military in Tran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Press, 1997), p. 215。

註72 杜黑著，史流芳譯，《制空論》(台北：空軍總部出版，1990年)，頁6。

註73 Ka Po Ng, op. cit., p.95.

註74 劉順堯，〈迎向廿一世紀的中國空軍〉，《中國空軍》，2000年，第2期，2000年4月，頁5。



此，90年代之後，中共開始採用新材料、新能源的武器裝備，配上新的信息技術和電腦，加之生產能力之提高，終於實現了武器裝備和作戰樣式的革命性變化，尤其是海灣戰爭更是傳統之局部戰爭形式與高技術戰爭的分水嶺，換句話說局部戰爭已進入了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歷史時期。【註75】

五、裁併軍區：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軍隊員額即有四百萬人以上；韓戰時更高達六百萬人以上，戰後軍隊雖完成復原，仍保有四百萬左右兵力；1965年中共廢除「軍銜制」，軍隊冗員增多到四百八十萬左右；經過1982年戶口普查及隨著幹部離職、轉業及撥交部份軍人於地方成立「人民武裝警察」，1984年，中共仍保有三百多萬人部隊；1985年在中央軍委會中宣佈再裁軍百萬原因，如同胡耀邦在會中所說：「我們要集中財力、物力搞經濟建設，經濟搞上去了，加強國防建設也就好辦」。【註76】

換句話說，是不得不遷就「先經濟、後軍事」的建設。因為此時期中共經濟成長指數一直無法達到預定標準，因而影響到國防經費的預算編列，又逢80年代初，國家經濟轉為重視民生工業所帶來之衝擊，鄧小平雖再度復出，強調全力振興經濟，致使國防預算大幅緊縮，從1979年占全年國家總預算的18.5%滑落至1989年的8%，導致專業技術人員轉往民間企業任職，以便施展長才並追求高薪，經費與發展順序的限制，因而使空軍優先發展的計畫失敗，空軍的發展因而受挫。【註77】

為此，中共開始裁減100萬人員，其中包含將中共11個作戰區合併為7個軍區(如下表)。【註78】

裁併軍區不僅是針對鄧小平所說目前實施軍隊現代化的五大病症障礙：一是思想不純；二是文化不足；三是機關臃腫；四人員過多；五是高幹老化。而實施精兵政策、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更要將節省下來的經費重點用在改善武器裝備和提高人員素質上。其目的如同中共「兵器工業部」部長鄒家華指出：「軍隊員額減少了，但對武器裝備性能和質量的要求也提高了，也就是說，對兵器工業的要求提高了。為的是要堅持不渝地發展和改進我軍的武器裝備，建

註75 劉森山主編，《高技術局部戰爭條件下的作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4。

註76 中共年報編輯委員，《1989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9年)，頁3-15。

註77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26。

註78 伊凡·費根寶(Evan A. Feigenbaum)，余佳玲、方淑惠譯，前揭書，頁80；中共年報編輯委員，前揭書，頁3-19。



表二 中共裁併軍區調整表

原軍區名稱	轄管地區	新軍區名稱	轄管地區
北京軍區	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	北京軍區	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
瀋陽軍區	古	瀋陽軍區	吉林、遼寧、黑龍江
濟南軍區	吉林、遼寧、黑龍江	濟南軍區	山東、河南
武漢軍區	山東		河南劃入濟南軍區湖北劃入廣州軍區
廣州軍區	河南、湖北	廣州軍區	廣東、廣西、湖南、湖北
南京軍區	廣東、廣西、湖南	南京軍區	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福州軍區	江蘇、浙江、安徽		併入南京軍區
成都軍區	福建、江西	成都軍區	四川、西藏、雲南、貴州
昆明軍區	四川、西藏		併入成都軍區
蘭州軍區	雲南、貴州	蘭州軍區	甘肅、青海、陝西、寧夏、新疆
烏魯木齊軍區	甘肅、青海、陝西、寧夏		併入蘭州軍區
	新疆		

資料來源：中共年報編輯委員，《1986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6年），頁3-19至3-20。

設一支素質優良的現代化軍隊」。^{【註79】}

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更於1988年5月在北平召開的高層會議中提出「確立和調整新時期的軍事戰略」三個問題：一是要著重對付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二是要加強和建設拳頭部隊；三是要對未來戰爭和遠程國防、軍事發展作出比較確實的估計。^{【註80】}從此談話中，不難了解面對局部戰爭的挑戰，中共現階段所要重視的不僅要建立一拳頭部隊以為因應，更要預測出未來戰爭可能的發展，而及早規劃相適應的現代化國防軍備。

肆、研究中的發現

- 一、中共非常重視歷史研究的方法，汲取其經驗教訓：鄧小平從局部戰爭高技術特點所顯示，指出「現代戰爭對技術裝備的客觀要求和我軍武器裝備還存在比較落後的失衡狀況下。遂於1985年11月30日成立國防大學，其課程著重在高級理論及有關戰略和國際現代化等問題研究，其目的在著眼於培養90年代以至下一世紀初葉所需要的高級指揮幹部。^{【註81】}」此顯示中共非但重視空軍作戰理論的研究，更從人才軟體培育著手。
- 二、中共評估其空權思想發展趨勢：80年代，中共在面對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外在環境改變下，鄧小平預估中共差不多會有半個世紀50年之久的時間來全心投入

註79 中共年報編輯委員，《1986年中共年報》，頁3-4至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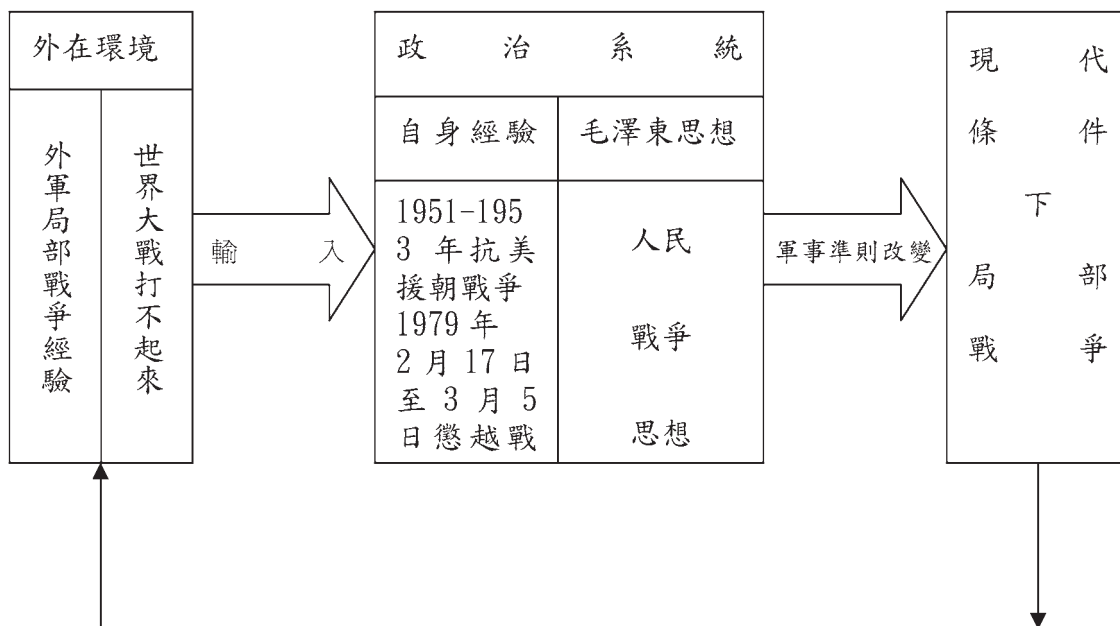
註80 中共年報編輯委員，《1989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9年），頁2-66。

註81 中共年報編輯委員，《1986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6年），頁2-17。



經濟改革。【註82】然又受80年代前後的歷次局部戰爭影響，中共國防建軍在面對未來局勢大戰打不起來情況但卻要受高科技的挑戰下，遂評估、思考將「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思想」，其形成的評估(如下表三)。

表三 影響中共朝向局部戰爭思想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而欲發展以空軍為首的傳統武器裝備，來屏障國家疆域內的安全，可是在歷經文革後國內經濟惡化與政策的擺盪不定，中共空軍的武器裝備仍然是以防空為主的機隊所組成，與要從事積極主動防禦的制空作為仍有段差距，如同杜黑所說：「在未來戰爭中，空中艦隊將竭盡全力向敵人衝去，並企圖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將自己的兵力於同時時間內集中使用，因此空中戰爭的勝負，係由戰爭爆發時雙方現有的空中打擊力的大小而決定，在戰爭的期間內要想把空軍建設起來，似乎是絕對不可能的。未來戰爭的決戰將在空中，因此，軍備建設及作戰指揮應依照下面的原則做法：地上實施抵抗，空中實施攻擊。因為空中的決戰將會先於陸海軍的決戰」。【註83】質言之，杜黑認為惟具有轟炸攻勢能力空軍，才能獲得制空權。驗證局部戰爭的發展規律，評估自身的能力，顯然此

註82 伊凡·費根寶(Evan A. Feigenbaum)著，余佳玲、方淑惠譯，前揭書，頁110。

註83 馮德彪、游崇鼎，前揭書，頁72。



階段，中共要落實國土防空攻勢空軍建軍的目標仍有一段艱辛道路要走。

伍、結語

過去中共空權的發展受制於自身經驗的短視——以核武與陸軍為優先，後又受文革影響，空軍的發展更停滯不前，遂使得1979年懲越在缺乏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下敗戰；到了80年代，受外軍歷次的局部戰爭影響，體會到過去毛澤東時期的戰略構想是要打一場世界大戰，而重視消耗戰的長期準備，輕忽常規武器的發展是錯誤的政策；此時此刻的重點是要在面對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威脅時，需具備攻勢軍備，俾能因應高強度的空中作戰，然而過氣的60年代空軍武器裝備實在無法滿足戰場需要，如同鄧小平有感而言：「空軍停留在殲—6戰機的水平叫優越嗎」？【註84】

儘管準則調整是強化國土防空，是要在國土、疆域的邊界上從事作戰，甚面對從海上來襲的威脅挑戰，但是落後的武器裝備，絲毫無以為屏；及至90年代，受1991年波灣戰爭影響，才警覺到落後的武器裝備根本不是具有優勢武器先進國家的對手，要想在未來戰爭中贏取勝利，就必須研究發展新的武器裝備系統，尤其是「非對稱作戰」與「殺首」武器裝備的研發更顯重要，直此之後，中共才不遺餘力競相發展新武器裝備因應未來挑戰以制敵。【註85】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

學歷：空軍軍官學校66年班、情報研究班85年班、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所碩士。經歷：教官、組長、兼任講師。現職：專職軍事寫作。

註84 姚延進，劉繼賢主編，前揭書，頁138。

註85 Ka Po Ng, op. cit., p.104